

余华《第七天》引发探讨：

小说如何深度表现当代中国

□本报记者 王 杨

近期,余华小说《第七天》的出版成为文学界的热点。除了媒体和评论家的持续报道和关注,读者也在微博等互动平台上对小说展开热烈讨论,观点呈两极分化。有人赞赏余华以乱象丛生的社会现实作为对象,从现实出发,通过荒诞的叙述展现当代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存状态。有人则批评《第七天》是“时评家对新闻的一份平庸剪报”,“有东拼西凑的嫌疑,使用的也都是近年来关注度较高的负面社会新闻的素材,看似颇有讽刺的意味,但实际上不痛不痒”。“新闻串烧式的写作”似乎成为《第七天》被诟病最多的一点,而实际上,人们对余华的指责,并不在于他在小说中写到了众多新闻事件,而在于他对现实素材采用的罗列式的处理方式。作家的超越性、文学作品有别于庸常人生的复杂性和洞见力在一个接一个的社会事件叙述中被淡化了。对《第七天》的争论焦点,仍然指向中国作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难题:文学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

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责任值得尊敬

余华写《第七天》就像和现实贴身肉搏,不同人的死亡与众多社会事件一一勾连:强奸、死婴、卖肾、高价墓地、警察毒打、男扮女卖淫等,以此串起一个个荒诞的故事。他以死人的视角来切入叙述,赋予作品寓言色彩,死后世界的平等友爱与现实世界的荒诞冷漠形成强烈对比,表达出对丑陋现实的讽刺。评论家张新颖从中读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发生的再奇怪的事情都不是新闻了,整个时代本身变成了一则新闻,而处在时代当中的每个人身边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这个巨大新闻里面的日常生活。”张新颖认为,余华是把社会事件当成日常生活来写,触及了这个时代中人讲不清楚、不愿意写的东西,实际上反映了现实当中的人如何来理解这个时代的问题。

不止余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这一主题在很多

莫言：小说要贴着人物的性格来写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燕山书院联合主办的2013年度“多闻多思学术公益讲座”日前在京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作家莫言。在主持人白岩松的提问下,莫言就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作家的自我定位、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对此,莫言表示,现代文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当代文学也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差。现代文学和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当代文学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和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当代作家都从现代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很多是现代文学中的课题的延续,他们所使用的艺术手法、语言方式很多都借鉴了现代作家的探索成果。因此,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当做对立的事物来进行比较并不科学。

谈到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莫言希望文学批评“要有善意”、“要以文本为依据”。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曾尖刻地批评过别人的作品,后来他对此进行了反思——“过分尖刻的批评会让人感觉充满了恶意”。批评的目的应该是希望作家能够把作品改好,因此批评家应该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指出作品的问题所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那些逞口舌之快、尖酸刻薄的批评,也许会起到哗众取宠的效果,也可能赢得很多的掌声,但是不会有好的效果,也不会让受批评者心服口服。另外,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要立足于文本。

关于艺术作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莫言认为,当大家都纷纷学习、模仿西方的时候,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是有必要的。但因此认为只要具备了民族性就必然具有世界性,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只有作品具备了世界性,才有可能把民族性带出去。”当我们的作品反映了普遍的人性,抒发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才有可能感染外国读者。当然,文学作品也必须有民族性,因为“每个作家都生活在中国的现实之中,我们所听到、看到的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当作家把感受最深切的东西描述出来,就必然带有中国的特征”。

谈及自己的写作,莫言称自己一直“作为人民在写作”。他说,作家只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要真正和他们贴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代表人民的心声。但是,作家在写作之初就想着通过作品来反映这个广阔的时代,这是不自量力。”他认为,写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劳动,作家应从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写感受最真切、最有把握的那部分生活。这样的写作把握不好会陷入个人的“小痛小痒”、“小恩小怨”,没有人民意识、时代意识。但如果作家的痛苦和整个时代的痛苦恰好同步,那么他从表现自我出发的作品就可能带有普遍性、人民性。

人物被认为是小说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莫言提到,小说“要盯着人来写,贴着人的性格来写”。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要借助人物表现思想,自己跳出来在作品中议论是比较笨拙的。谈及小说如何反映现实,莫言表示,当下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但无论多么尖锐的事件和现象,只有经过了文学化的处理才能够写到小说中。写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写人物,那些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只是“写人的背景”,因此作家所描写的事件应该符合人物性格本身的发展逻辑。

很多读者都好奇,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后,是否写了什么新的作品。莫言说:“从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我没有写小说,也没有写剧本,只写了一些很小的文章。我也很焦虑,老想赶快坐下来写。”但是,由于各种事情,他“赶快坐下来写作”的愿望迟迟没有实现。对于将来的写作,莫言表示不会因为获得“诺奖”而背上包袱。“我要忘掉过去的荣誉,写作的时候我还是过去的我,要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还要有胆量,不要怕写坏,不要怕写出来被人笑话,这样才能轻装上阵,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中国作协召开作家维权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在京召开作家维权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张健主持。会议主要就文学期刊数字化和青年作家维权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的转变,文学作品数字化是必然趋势。会议提出,纸质版权和数字版权是两个独立的权利,作者在投稿时必须分清。目前不少期刊在版权声明中表示投稿即意味着将电子版授权给期刊社,期刊社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电子版稿酬,如有异议请在来稿中说明。对于这种单方声明,绝大多数作者只能被动接受。其实,这类声明的法律效力有待认定。

与会专家建议,文学期刊数字化应在纸质期刊稿酬基础上体现电子期刊稿酬,稿酬计算应体现数字版权特点。应通过技术手段或监管手段,优化数字期刊收益分配。各大文学期刊、出版单位应主动加强监管,提高数字期刊授权情况及

稿酬计算透明度,保障作者的知情权。

会议还讨论了青年作家维权问题,认为青年作家应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被侵权人意识”,在遇到侵权问题时,敢于主张自己的权利。中国作协应关注青年作家的生存状况,加强对青年作家的多途径维权普法宣传,帮助青年作家增加维权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与会者还肯定了中国作协保办近期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与美国苹果公司知识产权代表会谈并建立“通知-删除”快速处理机制;公开声明表示支持杨绛先生维权;召开当天“0元销售”侵权事件通报会;针对各大网站版权合同不统一、不规范现象,制作标准合同和调查问卷等。

张健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委员们要加强学习,注重对有关信息的收集与反馈,关注并研究当前作家维权的热点与难点,共同努力把维护作家权益的工作做好。(权文)

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

本报讯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自2009年9月在呼和浩特落成以来,在收集、珍藏、展示、交流、研究、出版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和作家队伍整体状况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引起文学界、教育界广泛关注。从2011年开始,中国作协便组织全国的作家分期分批到这里参观学习,共同为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的建设献计献策。2013年的参观采风活动于近日举行,以葛莫政为团长,冯艺、叶广岑、王俊康、哈图卓日克、迪楞贵、陆梅等为团员的作家代表团一行28人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馆长特·赛音巴雅尔等作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并在宣传推介该馆教学、科研成果,展示少数民族文学成就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共识。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坐落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内,占地100亩,总建筑面积7620平米,馆楼呈古代竹筒外观,与周围的小桥流水、雕塑假山相映成趣。代表团的作家们仔细参观了“历史长河”“辉煌当代”“群星灿烂”“红日照耀”“激扬文字”“梦想成真”“书生意气”“知识之海”等8个展厅,对该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能够收集、挖掘和抢救1700多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著作、手稿、书信、照片、实物及相关资料赞叹不已。像《蒙古秘史》骨雕独本这样的一些馆藏珍品更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让人不禁对悠久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学心生敬畏。代表团的作家表示,创意建立这座“文学馆”,作家特·赛音巴雅尔和内蒙古师范大学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和研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馆内的“古韵”和“雅乐”两栋作家别墅,接待条件非常好,是国内外作家创作疗养的好地方。文学馆就像它的书卷造型一样,在讲述博大厚重、意韵悠远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同时,吸引我们领略优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韵,了解悠久的少数民族文学传统,感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

在内蒙古期间,作家们还参观了内蒙古博物院、蒙牛工业园区、盛乐博物馆、成吉思汗陵、天骄博物馆等。(籍云 德喜)

《杨绛文集》修订本将出版

本报讯 在杨绛先生102岁生日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汇集先生迄今主要创作和翻译作品的平装本《杨绛文集》,此外《杨绛文集》修订本也将于今年年底面世。

据了解,这套文集共约250万字。其中一至四卷为创作部分,第一卷小说卷选收长篇小说《洗澡》和7篇短篇小说;第二、三卷“散文卷”选收《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写与杂忆》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之初所创作的全部重要散文;第四卷“戏剧论文集”,收入两部喜剧《诚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文论”部分汇编了作者评析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以及她论述《红楼梦》和谈文学创作与谈翻译等论文14篇。第五至八卷译文部分则收入译作《堂吉珂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作为迄今汇集杨绛作品以及图片最为完整的作品集,该“文集”在原有发表作品的基础上,还收入《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怀念陈衡哲》等新文章,杨绛撰写的《作者自序》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以及大量她亲自为文集选订的珍贵文献和人物图片。

出版“文集”并不是杨绛创作的终止,杨绛表示,只要身体健康,她还将再写一些回忆性散文。(欣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20项审批职责

据新华社电 中国政府网7月17日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按照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加强组织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公共服务,大力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同时加强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体制改革。

根据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取消了20项审批职责,其中包括取消举办全国性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审批,调控书号总量职责,在境外展示展销国内出版物审批,设立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单位审批,以及取消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职责,工作由中国出版协会承担,取消报纸、期刊综合质量评估职责,工作分别由中国报业协会和中国期刊协会承担等。被取消的审批职能还包括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所需进口设备、器材、胶片、道具审批,军队协助拍摄电影片军事预算审批,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公司股权性融资审批,一般题材电影剧本审查等。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将国外人员参与制作的国产电视剧审查职责,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审批职责,音像复制单位、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审批职责等7项职责下放给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晓静 王帅)

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讲座预告

时间:7月21日9:30—12:00

主讲人: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题目:先锋诗人精神世界的文化反思

——以海子、戈麦、顾城为中心



以“从香港阅读世界——阅读·令世界美好”为主题的第24届香港书展7月17日起一连7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560家出版商参展。本届书展在“文艺廊”特设了三个专区,包括“年度作家”陈冠中专区“我这一代香港人”、“卫斯理五十周年展”和“人间净土——走进莫高窟”。此外,书展还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设置了“莫言专区”。近年来,电子出版物受到追捧,书展也为读者带来多种刊物刊物的选择。书展期间还将举办400余项文化互动,王安忆、张大春、席慕蓉等300余位作家和演讲者,将与读者交流、分享阅读乐趣。

图为小朋友在香港书展儿童读物展台参观

新华社记者 金 怡 摄

梁鸿“梁庄系列”作品

讲述城市化中的“村”与“人”

本报讯(记者 刘颖) 梁鸿“梁庄系列”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行。李敬泽、王新清、吴义勤、施战军、彭学明、何向阳、孙郁、程光炜、张清华、阎连科、张燕玲、李洱等参加研讨。

“梁庄系列”是作家梁鸿创作出版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也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已出版《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部。《中国在梁庄》记述了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真实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出梁庄记》将关注的目光由梁庄投向全国,直击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梁庄人的悲欢离合。

与会者认为,“梁庄”系列作品用文学语言反映了农民命运的时代变化,反映了我国城乡大变动过程中的农村现状。李敬泽提出,“梁庄”系列作品涉及的问题是当代知识分子最关注的问题。在这两

本书里,梁鸿的介入做了什么?她做的这些事使这个问题场域增加了哪些新东西,都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

与会专家肯定了“梁庄系列”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并就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谈到,“梁庄系列”显示了梁鸿的担当精神,“梁庄”系列作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范畴。作品采用的“非虚构”写作手法以及作家的调查态度和创作方法对当今文坛的文学研究有重要启示作用。

梁鸿表示,书写梁庄源自一种情感冲动。但是,在写完之后,她自己产生了一种失败感。因为,写完之后,甚至还写完了自己就已经离开了。她说,“我怎么梳理和故乡、亲人的关系?我写完了,收获了名和利,然后走了。我没想到我和故乡就是这么一种残酷的关系,这让我感到惭愧也很迷茫。”